

1848年前的法国正统派

刘 文 立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右派有三个组成部分:传统的正统派、倒台的奥尔良派和专制的波拿巴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而为“秩序党”,是反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反动势力。本文试对正统派的历史渊源作初步探讨。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右派”的出现,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中期的“投石党”之乱,甚至追寻到16世纪下半叶的宗教战争。但是史学界普遍认为,法国制宪议会1789年9月11日会议上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代表阵线分明,以近乎集团的形式分别坐在右边和左边的议员席位上,如此一种有象征性的历史场面可以当作政治词汇“右派”(或“右翼”)和“左派”(或“左翼”)出现的标志。1789年大革命是近代法国社会所经历的不间断急剧动荡的开始,也是后来称为正统派的这个右翼派系形成的时期。

1789年夏,在路易十六之弟、阿尔图瓦伯爵的煽动下,便有首批贵族和教士出逃国外。巴斯底狱的攻占、“大恐慌”以及十月事件加剧了这股浪潮。路易十六本人早在1790年10月就决定离开法国,不惜通过奥地利和瑞典使节秘密策划,酿成了次年6月的发棱事件。1791年冬,随着部分军队首领的叛逃,流亡者在法德边境的科不棱茨(这里有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和阿尔图瓦伯爵即后来的查理十世)、伦敦、布鲁塞尔、瑞士、卡塔卢尼亚和皮埃蒙特等地聚集,他们投效外国宫廷,与留在国内的王党分子尤其是西部旺岱郡的舒安党人勾结,向革命反扑。波旁家族的支系,孔岱亲王在沃尔姆建立了“孔岱军”,阿尔图瓦伯爵在都灵一度安置过自己的“宫廷”。流亡者以及国内的王党分子成为正统派的先驱。

国民公会、督政府、执政府和帝国时期,流亡和留在国内的王党分子的复辟图谋从未停止,他们在1793年、1795年秋、1797年春和1799年初迭次策动叛乱,与拿破仑军队作战的反法同盟军中,就有不少知名的王党分子。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王党分子将其8岁的次子“圣堂的遗孤”尊作“路易十七”,以示波旁家族的王统并未中断。1795年“路易十七”死于狱中,其叔父普罗旺斯伯爵继承“王位”,自封为“路易十八”,并且致函第一执政要求准许他回国登基。

为了挽救倾覆中的旧制度,拥戴“正统”王位的右派理论家在思想战线也与革命的学说和舆论激烈交锋,如蒙特洛西埃伯爵、波纳尔子爵、昂弗雷格伯爵、夏多布里昂子爵、制宪会议议员卡扎雷斯和政论家里瓦罗尔等人。他们不同程度地诋毁正在发生的带“颠覆性”的巨大社会变革,或鼓吹全盘恢复1789年前的社会状态,或宣扬在保留三个等级的前提下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有的人如修道院院长巴吕埃尔还杜撰神话来解释这场大革命。约瑟夫·德·梅斯特则在所著《论教皇》中为教权主义和专制政体竭力辩护。反革命舆论的一个共性是谴责革命原则,强调“历史延续性”即维护“合法王统”的重要性。应当指出,这一时期法国的反动思潮受英国政论家伯克的影响很深。此人早在1790年就写成《法国革命思考》,该书刚一问世即有法译本出现,被右派理论家视为反对大革命的“圣经”。

1814年夏波旁王朝(长支)首次复辟,为了维护“正统”原则,路易十八拒受帝国元老院为复辟王朝制定的宪法,而坚持由他“钦赐”法国一部体现旧制度王统的“宪章”。“宪章”6月4日在两院宣读,它的某些提法相当明确地体现出波旁王朝君主制的“历史连贯性”:如颁布日期注明为“朕在位第十九年”;序言里不厌其详

地追述自胖子路易以来王室对臣民的一切让步，从而显示，宪章部分地确认大革命的成果和它造成的社会变革乃是历代君主“恩泽”的延续。宪章第14条赋予国王发布“为了执行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规定和敕令”的专断权力；不难看出，这与路易十四“法律出自我”的专制格言一脉相承。

1815年7月，拿破仑“百日”政变后波旁王朝再度复辟，这次事变成为法国近代史上左、右两派的政治分野骤然明显化的里程碑。由于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利益冲突，观点歧异，左派和右派迅速具备了各自的集团心态，“两个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左派的法国”和力图恢复旧制度的“右派的法国”——之间斗争异常激烈。不言而喻，从国外回归，自1789年以来“一切都没忘记、什么也没学会”的流亡者是“右派的法国”的代表和核心。以他们为主的保王党人从现在起被称为“极端保王派”，是政坛的极右派，其首领为觊觎王位的阿尔图瓦伯爵；对于较有现实感的路易十八而言，这些人是“比国王本人还要保王的保王派”。拿破仑战败于滑铁卢成了举着白旗的极端保王派报复和倒算的信号，此种情形不以巴黎而尤以外省为甚，朗格多克、尼姆、旺岱和诺曼底等地接连发生拿破仑分子和革命派惨遭屠杀的事件。这一方面反映出大革命触及社会的深度因地域不同而大有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曾经强烈实施革命暴力的地方反革命进行了最疯狂的反扑。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815年8月选出的法兰西王国众议院，右派集团拥有压倒多数，392名（一说402名）众议员中极端保王派即极右派为350名（路易十八把它叫作“无双议院”）。“无双议院”里的极端保王派，大部分原是20多年中长期被排斥在政坛之外的外省中、小贵族。如右派在众议院里的头目维雷尔伯爵生于图卢兹；有“白色国民公会议员”之称的拉布尔多内伯爵来自安茹；维特洛尔男爵的故乡是上阿尔卑斯。有的极端保王派连宪章也不愿承认，阿尔图瓦伯爵的亲信波里尼雅克亲王就拒绝宣誓忠于宪章，他认为承认信仰自由的第5条褻渎了天主教。

1815年至1816年间，王国的立法机构由极端保王派所控制，行政部门却掌握在“中右”的立宪派手中，议会与内阁因而也有矛盾。众议院要求“在停止宽恕的地方行使司法”，叫嚷“行政部门只交予纯洁之手”，大规模审讯和清洗帝国官员，内阁却又采取某些折中措施来缓和“两个法国”的冲突，这招致了极端保王派尤其是他们的喉舌《白旗报》的抨击。夏多布里昂1816年撰写出《论宪章确立的君主制》，维特洛尔针对立宪派关于让国王而不由议会遴选大臣的主张刊行了《论代议制政府的内阁》一书，宣称“否认众议院（任命大臣）的特权，就是否认代议制政府本身”。人们注意到，这是极端保王派在他们充塞着两院议员席位时的论调；宪章建立的政体是不完备的畸形的半君主立宪制，使得政坛各派能够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援引宪章的有关条款——它们有些含混不清甚至相互矛盾之处——以作出有利于己方的解释。

极端保王派的倒行逆施连“中右”的立宪派也不予以支持，路易十八对前者亦颇感气恼，他对俄国大使说：“如果这些先生有足够的自由，到头来会把我清洗掉”。1816年9月5日，国王宣布解散“无双议院”。此后3、4年间，这个极右派别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他们在与立宪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继续角逐时，着眼于“路易十八之后”。1820年2月13日夜，阿尔图瓦伯爵之子、王位继承人贝利公爵被刺，极端保王派以此为契机，再度煽动反动浪潮。他们立即迫使立宪派重臣德卡兹公爵去职而让维雷尔伯爵等人入阁。6月29日，他们强迫通过宪政史上臭名昭彰的“双重投票法”，使得同年11月选出的众议院里这个极右派又获多数：220名当选议员中以极右派为主的右派集团占了198人。极端保王派操纵了行政和立法机构，其首领阿尔图瓦伯爵于1824年9月还取代死去的路易十八而登上王位（在兰斯大教堂依照旧制度的礼仪隆重加冕）。数年里这些土地贵族的封建复辟遂又嚣张一时：他们残酷镇压烧炭党人（20年代初）；法军在阿尔图瓦伯爵之子、昂古列姆公爵率领下用神圣同盟的名义远征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统治（1823年）；通过“赔偿流亡者10亿法郎法”（1825年）；力图通过保护世袭产权而违背《民法》原则的“长子继承法”和旨在取缔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出版法”（1827年）。这些反动行径是波旁王朝封建复辟的重要标志。极端保王派在1824年选举的众议院中再获压倒多数，资产阶级自由派议员仅15人，从而使这届众议院有“重获的无双议院”之称。为了让极右派长期独霸立法机构，维雷尔内阁迫使通过一项法律将众议院任期5年改为任期7年。

作为极端保王派的一翼，天主教会的反动也不逊色。由于反动教士的压力和蛊惑宣传，1825年“褻渎圣物治罪法”得以通过。教会尤为注重从思想根源上消除大革命的影响。出任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的弗雷西努斯大主教写了《捍卫基督教和法国教会的自由》一书，他直接组织了对文化教育界的镇压。传播资产阶级观

念的重镇高等师范学校遭到封闭；自由派学者基佐的历史课程被明令停授；法学院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辞退了一些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教授；连自然科学也难幸免，11名医学教授被革除职务。在大量创建教会学校的同时，派遣不少教士担任公、私立中学的校长，教员必须具备由本堂神甫签署的“行为良好证书”。早在1814年以前反动教士就成立了一个秘密社团《修道会》，复辟后它更肆无忌惮。《修道会》谋求恢复自革命以来大部分人不举行的宗教仪规，向全国各地派出神甫“布道团”宣讲教义，举行宗教游行，竖立“布道十字架”，活动相当猖獗，史称继“白色恐怖”之后的“黑色恐怖”。

就这样，20年代初、中期，极端保王派的僧俗两翼，凭藉“王位和祭坛”的结合，为使旧制度复辟作了疯狂的尝试。

然而，这种尝试是绝望的。

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以后，经济、政治、思想和宗教诸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9世纪20年代，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正准备作为“第三位战士”投入夺权斗争，广大农民与土地贵族的矛盾非常尖锐，他们是“左派的法国”的社会中坚。主要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在社会上层，以全民代表的身份自居，在政界特别是舆论界很有能量。他们依靠宪章确认的某些民主权利持久地投入“合法的”选举斗争，逐步排挤极端保王派而扩大自己在众议院里的势力，终于以180名议员当选而成为1827年11月产生的众议院里的多数派。这标志着复辟时期极右派在王国主要立法机构中政治优势的结束，从而导致主宰行政部门达6年之久的维雷尔内阁倒台。查理十世被迫暂时起用“中右”的立宪派人士、波尔多的律师马提尼雅克予以取代，这是极端保王派最后反扑前的喘息。马提尼雅克内阁既使资产阶级自由派感到失望，又让极端保王派存有疑虑，无法维持政治平衡，很快就被查理十世以内阁再也不能获得众议院多数派的支持为借口而罢免。1828年8月8日，查理十世无视除极右派外的所有政治派别的反对，强行任命了几个臭名远扬的极端保王派分子组阁：《修道会》成员波里尼雅克亲王任首相兼外交大臣，此人9岁时流亡国外，曾密谋反对拿破仑；拉布尔多内为内务大臣，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后，他叫嚷要用“镣铐和刽子手”来对付“百日”期间拿破仑的拥护者；布尔蒙伯爵当陆军大臣，这位前舒安党人一度归附拿破仑，于1815年6月林尼之战前夕投敌，而为千夫所指。

极端保王派为查理十世这一专断行径辩护时，在对宪章的解释上引人注目地采取了与1815—1816年他们掌握“无双议院”时期相反的观点，即援引宪章第14条强调由国王而不是由议会遴选大臣的权利，这一点在他们的法学家科杜的言论中反映得十分突出。资产阶级自由派则以221名众议员签名的一份致国王的著名“请愿书”作为回答，称“宪章……视全国参与关于公共利益之商议为一种神圣的权利。宪章使陛下的政府之政治观点与陛下的人民之观点持续地协同一致成为确保公共事务正常进行所必需的条件，陛下，我们的真挚和忠诚迫使我们向您直言，此种一致性并不存在”。查理十世旋即宣布解散众议院，不料在新选的众议院中自由派仍居多数，而且增至270名（一说274名）。极端保王派除密谋政变，已别无他途。为此，内阁首相波里尼雅克率各部大臣联名上书，启奏查理十世根据宪章第14条采取行动。7月25日，查理十世签署关于取消新闻自由、解放新选的众议院和修改选举法等4项敕令，引爆了巴黎民众7月27日、28日和29日的革命行动，复辟王朝在“三个光荣日”中倾覆。

8月2日，退至巴黎近郊朗布依埃的查理十世宣布“让位”给他的孙子波尔多公爵（即尚博尔伯爵），称“亨利五世”，以维系和延续“正统的”波旁家族长支的王朝。但是，众议院拒不承认“亨利五世”，而拥戴属于波旁家族幼支的奥尔良公爵登上了王位。从此，仍然效忠被废黜的波旁家族长支王室的极端保王派自命为“正统派”，他们在西部和南方一些地区仍有不可忽视的势力。8月7日，夏多布里昂在议会发表不愿抛弃长支王室、拒绝与7月王朝合作的演说可以视为正统派下野的政治宣言。

奥尔良派上台后立即在立法和行政部门大规模清洗正统派。他们褫夺了68名正统派众议员的资格，宣布175名正统派贵族院议员的资格无效（其中包括所有由查理十世册封的贵族院议员），一举将正统派全部逐出议会。至于正统派的文武官员，有76名省长、196名专区区长以及大约400名市、镇长被撤换，65名将军被取消军衔，大批外交官和法官被免去公职。奥尔良派新政权规定，参加竞选的人必须宣誓忠于1830年8月14日众议院通过的修改后的宪章。大部分正统派拒绝归附“街垒中产生的国王”路易-菲力普，他们只得重返外省，身为土地贵族而回到自己原有的封地。在古老的城堡里，这些人维持着旧制度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交

礼仪,遵循从前的规范进行宗教活动,纪念对于波旁家族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如1月21日(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和2月14日(贝利公爵遇刺),阅读自己的派报《法兰西报》、《日报》、《时风报》和《民众报》,就复辟王朝倒台的原因争吵不休。他们远离了政坛,远离了时代,而在“国内流亡”。也有少数正统派不甘寂寞,贝利耶和法卢等是此类人物的代表。贝利耶律师进入7月王朝众议院,成为正统派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对奥尔良派的政府时而猛烈抨击,时而以局外人的身份“客观地”评头品足。1839年莫莱内阁时期,以他为首的小小的正统派议员集团还曾参与反对派同盟的倒阁运动。

一些与波旁家族长支王室关系最深的死硬正统派追随废王第三次流亡,先去英国的爱丁堡,再赴布拉格,最后定居意大利的哥里茨。几位亲王不承认查理十世已“让位”于波尔多公爵,依旧尊他为王。1836年10月查理十世死去,其子昂古列姆公爵承袭了“正统”王位,自封为“路易十九”。但是,“亨利五世”在国内外的正统派中有较多的拥护者。1832年4月,其母贝利公爵夫人秘密地离开流亡地在马赛登岸,经过普罗旺斯到达旺岱,煽动那里的正统派再度叛乱,以确立“亨利五世”的统治,但她在同年6月被捕,叛乱因而失败。1842年路易-菲力普的长子奥尔良公爵死去,消沉了几年的正统派复辟图谋又有所抬头,1843年12月包括一些众议员在内的约千名正统派公然前往国外拜谒“亨利五世”,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

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从19世纪30年代起法国的阶级关系产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以1831年和1834年两次里昂起义为标志而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面对着最大的敌人和共同的威胁,土地贵族和金融、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缓和,它们的对立已远不如复辟王朝末期那么尖锐。此外,年代的推移使得旧人纷纷故去,在19世纪上半叶左右法国政坛的这两个达官显贵阶层中,新的政界人物不断涌现(比如1839年选出的众议院里,58%的议员是1789年以后出生的),他们之间不象各自的前辈那样积怨深重。上述这些因素促使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逐渐相互靠拢,因为共同利益攸关而终于在第二共和国期间勾结成了“秩序党”。

主要参考书目:

1. 勒内·雷蒙:《法国的右派》,1978年,巴黎版(René Rémond:《La droite en France》,1978, Paris)。
2. 阿·雅尔丹、阿·吉·杜岱斯克:《达官显贵的法国1815—1848》,1973年,巴黎版(A. Jardin et A. J. Tudesq:《La France des(notables)》(1815—1848),1973, Paris)。
3.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1976年,巴黎版(Pierre Miquel:《Histoire de la France》,1976, Paris)。
4. 安德烈·马尔坦-潘纳蒂埃:《1789年至今的法国制度和政治生活》,1981年,巴黎版(André Martin-Pannetier:《Institutions et vie(politique française de 1789 à nos jours)》,1981, Paris)。
5. 米歇尔·沃维尔:《王政的倾覆》,1972年,巴黎版(Michel Vovelle:《La Chute de la monarchie》(1787—1792),1972, Paris)。
6. 《1789年以来的法国宪法》,弗朗马利翁出版社,1970年,巴黎版(《Les co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9》,Flammarion,1970, Paris)。